

◀ (上接 12 版)

自日人所藏写卷者,如《书舶庸谭》卷二(2月)9日条载:“又唐写本《序听迷诗所经》一卷,凡一百七十行,为故友富冈氏所藏”。(《董康东游日记》,第52页。九卷本过录全文,而四卷本仅述其要旨,参见傅杰校点:《书舶庸谭》,第31页)不过,董氏此条所记有误,《序听迷诗所经》为高楠顺次郎所藏,而富冈谦藏所收为另一景教文献《一神论》。(此两种文献之真伪,屡有辩难,如林悟殊:《富冈谦藏氏藏景教〈一神论〉真伪存疑》,荣新江主编:《唐研究》第6卷,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;《高楠氏藏景教〈序听迷诗所经〉真伪存疑》,《文史》第55辑,2001年;后皆收入氏著《唐代景教再研究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3年,第186—228页)

据桑兵所引霍普科克《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》所记,“法方保管的严密引起一些中国学者的不满,指责伯希和并未真心履行诺言。其实此举并非针对中国学者。据说伯氏将文书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东方部的一个房间里,亲自掌管钥匙,引来不少法国同行的攻

击”。(桑兵:《国学与汉学——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》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,第112页)伯氏保管文书宽严松紧应前后有别,不可一概而论。如前述董氏目录称部分写本为“伯理和博士藏本”,内藤乾吉追忆其父湖南于“大正十三(1924)年秋,于巴黎伯希和教授宅,阅览第一断简(即P.3608《唐律》残卷——笔者注),且获准摄影,并烦当时留学巴黎的庆应大学松本信广教授将此照片带回”(译自内藤乾吉:《中国法制史考證》,第182页);《书舶庸谭》卷一上(1月)4日条载“夜取湖南影片,录三七零四(伯希和邸)《刘子新编》(六朝写本)二页始寝”(《董康东游日记》,第6页),可见20世纪20年代,伯希和为便于整理,曾将部分文书私置家中。至于《书舶庸谭》卷一下(1月)19日条载:“忆及癸亥(按:癸亥年为1923年,壬戌年为是。此点朱慧业已指出,参见董康著,朱慧整理:《书舶庸谭》,中华书局,2013年,第22页)岁晏,侨居美京使署,篋中携伯希和敦煌古写本五十卷,供余饕餮,适有是书(指《治道集》——笔者注)在内。”(《董康东游日

记》,第25页。此段及其后有关《治道集》之叙录,为四卷本所无)此处所谓“伯希和敦煌古写本”,应是照片而非写本原卷。董氏于1922—1923年赴欧美考察实业,行程为上海—日本—美国—法国—英国—美国—日本—上海(可参见胡光煦:《波逐六十年》,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》第62辑,文海出版社,1979年,第227—239页),他绝无可能携原卷抵美。

二

董氏于1933年11月应邀访日讲学,其行程记载勒为九卷本《书舶庸谭》之卷五至卷七。以下仅随文捡选纪事若干,并略事笺解,裨补缺漏。

1.卷五(1933年)11月8日条载:“先是,东京法学博士松本烝治等组织中国法制研究会。”(《董康东游日记》,第210页)所谓“中国法制研究会”,是指由村上贞吉(律师)、松本烝治(东京帝国大学商法教授)发起,于1930年前后成立,由东京帝大法学部的学者如我妻荣(民法)、田中耕太郎(商法)、小野清一郎(刑法)等组成,致力于注释、翻译、评论中华民国所颁重要法令的研究组织,于1945年二战结束后解体。学会的正式名称为“中华民国法制研究会”。(参见西英昭:《“中华民国法制研究会”经纬——资料的整理与介绍》,《法制史研究》第11期,2007年6月,第323—342页)

2.同卷13日条载:“午后,服部介绍法学博士仁井田升来见,赠余所著《唐令拾遗》一册。”(《董康东游日记》,第214页)仁井田陞于1933年出版《唐令拾遗》,1934年便以而立之龄荣获日本学士院恩赐赏,成名之早,鲜有出其右者。唯仁井田氏于1937年递呈博士学位请求论文《唐宋私法史文書の研究》,由此获法学博士学位,并于同年扩增为书《唐宋法律文書の研究》。(参见福島正夫:《序——仁井田陞博士戰前三大著的復刻にあたって》,仁井田陞:《中國身分法史》,東京大學出版會,1983年)董氏称其为“法学博士”,有误。

3.同卷29日条载:“接上海赵晋卿函,内附工部局何德全函,代英人钟思索此次讲演录中日文各稿。稿为仁井田译,商诸村上君,允译全寄沪。”(《董康东游日记》,

第225页)又,1934年《法治周报》第2卷第3期所载新闻《董康由日归国》称:“电通社六日东京电,中国古代刑法权威者、北京政府时代之司法总长、大理院长董康,去年应中国法制研究会之聘到日本,在东京帝大及各大学讲演中国古代刑法。董氏著作,一两日中可以出版,定八日离东京归国。”董氏日记所称英人钟思索要讲稿,由仁井田陞翻译,拟寄沪上出版;而《周报》所称“董氏著作”,即为英人索要之讲稿集结本(现存氏著《中国法制史讲演录》一种,文粹阁影印,无出版日期)。又,征诸《书舶庸谭》卷七(1934年1月)8日条“赴各处辞行……是日回寓甚晚,检点行李,已逾午夜”、同卷9日条“上午九时,乘燕子急行车南返……四时四十余分,抵京都驿”(《董康东游日记》,第266—267页),亦即董氏于1月9日西行上洛,并非如《周报》所言8日归国。

4.卷六(12月)6日条载:“午后二时,中央大学教授泷川政次郎御车来迓,由原嘉道介绍讲演。学生约二百人,四时半辍讲。”(《董康东游日记》,第234页)据泷川政次郎补充,此次演讲题为《中国历届修订法律之大略》,现场翻译为孙澁(即《书舶庸谭》中所记孙伯醇)。泷川氏为之译注,刊于《法學新報》第44卷第2號(1934年2月)。(《董康东游日记》,第234页)

5.同卷13日条载:“又《(唐)令集解》一册,据金泽文库本排印。”(《董康东游日记》,第240页)《令集解》所注释者,为日本《养老令》,己卯本缀“(唐)”字样,不啻画蛇添足。然朱慧以庚辰本为底本所作整理,仅书“《令集解》一册”(董康著,朱慧整理:《书舶庸谭》,中华书局,2003年,第206页),可见董氏对己卯本有所改定。

附记:2015年2月,关西大学玄幸子教授赠赠《内藤湖南敦煌遺書調查記錄》,该书收存内藤湖南“清国学部所藏敦煌石室写经繙阅目录”、“欧洲调查用‘董康目录’抄录原稿(敦煌莫高窟藏书录)墨书”、“欧洲调查用‘董康目录’抄录原稿(敦煌莫高窟藏书录)铅笔书”、“上海图书馆所藏‘董康目录’”四种影印件及前三种的校录稿,这是本文最终能够成稿的重要资料,谨此申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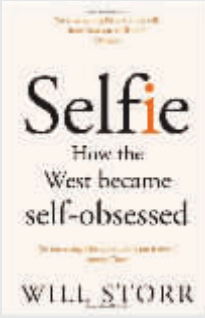
(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教授)

新书一瞥



《什么是真实的?量子物理学意义的未竟探索》(Adam Becker,Basic Books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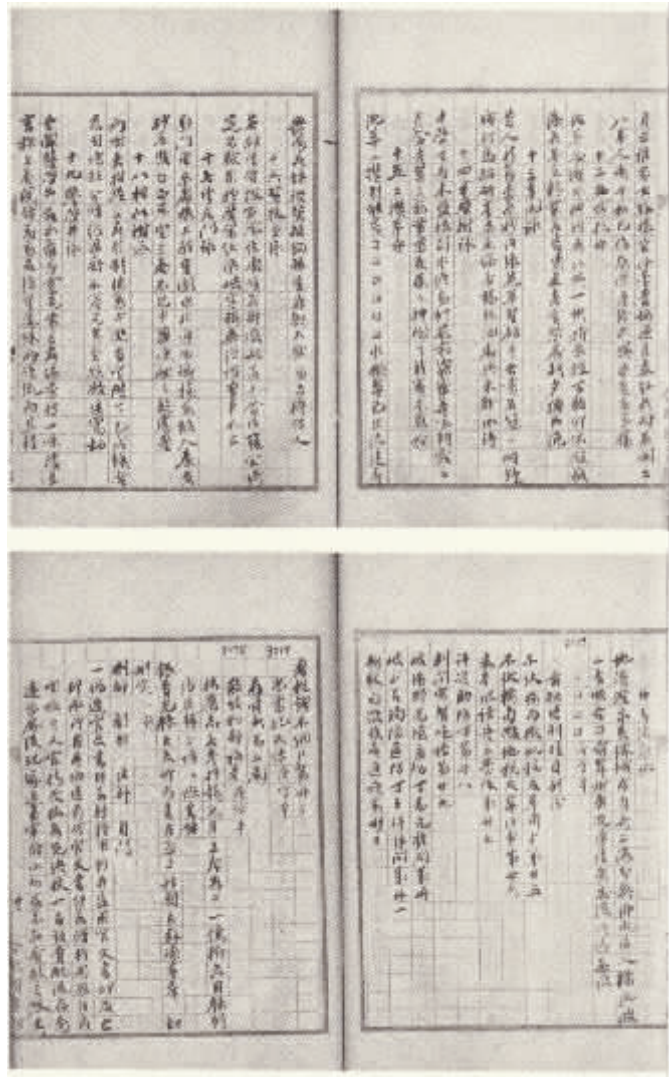
物理学家们都认同量子力学是人类最卓越的科学成就之一。然而,如果问量子力学究竟是什么,肯定会吵作一团。一个世纪以来,大多数物理学家都追随了尼尔斯·玻尔的“哥本哈根诠释”,并将量子物理学背后有关真实的问题视为毫无意义。长期以来,玻尔的学生们不遗余力地保护他的学术遗产,然而,约翰·贝尔(John Bell)、戴维·玻姆(David Bohm)和休·艾弗里特(Hugh Everett)等物理学家亦坚持寻找量子力学的真正意义。这本书正是关于这场思想斗争的故事,关于勇敢追寻真理、捍卫真理的科学家的故事。



《自拍》(Will Storr,The Overlook Press)

什么叫“自拍脸”?脑袋稍稍倾斜,一侧脸颊转向镜头,眼睛从不直视相机,嘴唇不自然地打褶……这种“现场”,很多人都看到过或被看到过吧。“自拍”行为涉及一个“鸡与蛋”的问题:人类捕捉和投射完美自我的渴望究竟从何而来?这种自恋的驱动力产生于技术之前还是之后?是智能手机唤醒了人类自恋的本能吗?

这个时代是技术决定论的黄金时代,人们不断担心Siri、Instagram或YouTube如何改变我们的大脑以及社会和政治的运作方式。技术悲观主义的一个经典案例就是:1993年,美国文化批评家尼尔·波兹曼(Neil Postman)在《技术垄断》(Technopoly)中提出警告——文化如何逐渐沦为技术的奴隶,并预测互联网会造就疏离的、愚蠢的人类。同理,今天不断出现的科技创新小工具可能也是导致“自恋症候群”的“罪魁祸首”。



上海图书馆藏董康目录《散颁刑部格卷》所在页(目录影印件取自玄幸子、高田時雄編著:《內藤湖南敦煌遺書調查記錄》,関西大学出版部,2005年)